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张宝三 徐兴庆 合编

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张宝三 徐兴庆 合编

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张宝三,徐兴庆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721-5

I. 德… II. ①张…②徐… III. 儒家-研究-日本-江户时代-文集
IV. B222-53 B31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060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122 号

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

编者 张宝三 徐兴庆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戴从喜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场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刷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6 开
印张 15.25
字数 237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
印数 5100
书号 ISBN 978-7-5617-5721-5/B·367
定价 29.8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涇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黄俊傑 谨识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序

黄俊杰

《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这部书，是台湾大学中文系张宝三教授与日文系徐兴庆教授合编的论文集。两位编者长期浸淫于日本儒学研究，他们深感日本学人有关日本儒学的论著不仅数量可观，每年如排山倒海而来；而且，其中品质精良，值得诵读再三者亦不在少数。为了让中文学界之有心于日本儒学的同道，也能对日本的相关研究业绩有相当的了解，张教授与徐教授从当代日本学者的论著中，精选了这六篇论文，并邀请一批青年学者译译为中文，辑为本书刊印，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中日两国虽然地缘接近，文化关系密切，但是双方的相互了解并不对等。日本从中古时代以降，就大举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例如“大化革新”深受大唐文化之影响，德川时代广泛吸收中国儒学并加以消化，明治维新则与阳明学说有其思想上之关系。由于历史的积淀，日本知识界对中国学问的研究，有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德川时代的儒学研究更是蔚为主流。但是，中国自古是东亚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华帝国结构稳定，自成一个“天下”，中国知识界之“文化唯我论”心态颇为强烈，所以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邻邦的兴趣不大，更遑论深入研究？早在1884年（日本明治十七年，清光绪十年），日本学者冈千仞（鹿门，1833—1914）旅游中国，经由历史地理学者杨守敬（1839—1915）的介绍而与李慈铭（1829—1894）见面。冈千仞对李慈铭说：“我邦学者无不涉中土沿革，而中土学士矍然我邦沿革。譬犹用兵，我了敌情，敌矍我情，非中土之

得者。”^①这场会面在冈千仞的《观光纪游》与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均有记载。冈千仞的说法大致符合实情。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戴传贤(季陶, 1891—1949)出版《日本论》,更极力呼吁:“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②戴季陶的痛切呼吁至今已经七十六年,海峡两岸中文学术界对于日本文化与思想的研究虽已累积若干成果,但仍有待大力提升。

由于深感中文学术界对日、韩地区研究的不足,所以,台湾大学的许多同仁一起合作推动《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的同时,对于当代日本与韩国学者相关论著的中译,也付出相当的精力。现在刊印的这部《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就是张教授和徐教授共同努力的初步成果。

这部书结集六位当前日本研究德川儒学的著名学者的论文,六位作者与台湾学界都有相当的关系,各篇论文所探讨的主题虽然各不相同、取径互异,但是各篇论文对于相关研究文献,尤其是学说史的检讨都赋予高度的重视。举例言之,本书第三篇作者平石直昭的论文,全面检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日本学术界,有关荻生徂徕的各种论著,并以丸山真男与吉川幸次郎的学说为中心,就是一篇值得精读的论文。这篇论文不仅使中文读者对于徂徕学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于当代重要学者如丸山真男、吉川幸次郎、甚至尾藤正英等人的学问,也有更深刻的体认。此外,本书其他各篇的内容,对中文读者也深具启发性,例如:渡边浩探讨朱子学之后中日思想界的异同,黑住真分析儒学在近世日本社会的普及化,辻本雅史讨论十八世纪下半叶,儒学在日本社会的深入影响,本乡隆盛研究藤田幽谷的《正名论》,宫城公子研究她所谓“儒学史上的幕末”时期之实学思想往近代日本社会下层渗透,凡此种种论述,都具有新意,而值得中文读者细嚼品味。

展望未来,日本儒学史研究这个领域在海峡两岸中文学术界,必将日新又新,绽放异彩。我相信,张教授与徐教授合编的这本《德川时代日本儒学

① 参见冈千仞:《燕京日记》,卷上,收入《观光纪游》(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页154。

② 参见戴季陶:《日本论》(台北:文物供应社,1954年),页3。

史论集》，将发挥承先启后之作用，在这个学术领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在这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特别向原作者、编者及译者，敬致祝贺与感谢之意。

2004年4月14日
于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导 言

徐兴庆

儒学于东亚文明之发展过程中，乃是一极为重要之课题。尤其自近世日本的德川幕府将朱子学列为官学以还，至十八世纪后期则又出现了折衷派、正学派朱子学。在思想与立场上，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古文学派、水户学派、闇斋学派等，彼此间之主张都存在着异同之互动关系。儒教的主体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截至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

本书收录日本学者探讨德川时代与儒学有关的论著六篇，研究范围涵盖与东亚文明渊源甚深的中、日两国之儒学发展之相关背景。首先就各篇论文作者的研究领域、方法及相关成果逐一介绍，再说明各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与其论述之重要课题，以供读者参考。

第一篇论文《儒学史异同的解释：“朱子学”以后的中国与日本》^①，作者

^① 渡边浩：《儒学史の異同の一解釈—“朱子学”以降の中国と日本》，收录于《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3章。

渡边浩先生，现任东京大学教授，专长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为避免只专注于单一国家研究而陷于狭隘认知，渡边教授经常从多角度的视野，研究与东亚儒学发展最密切的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政治、儒学思想之比较。渡边教授的研究领域极为宽广，研究对象不局限于儒家思想，亦不执着使用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经常将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尽可能对其作正确认知，同时着眼于当代思想对现代人具有何种意义而对之进行探究，从此角度切入，以撷取现代思想所以形成的研究素材。渡边教授之主要论著包括《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①、《东亚之王权与思想》^②，皆为与中日及东亚儒学思想有关之比较研究。

渡边教授于该文首先指出，中日两国在儒学的发展史中，双方皆以朱熹（1130—1200）为代表的“道学”——即广义的朱子学——为其有力之主轴而存续；另一方面，批判朱子学的思想仍不断出现。也就是说：双方的儒学史之基本结构很相似，而且双方批判朱子学的内容与形式往往也是相去不远。虽然如此，双方儒学史之差异性亦相当明显。例如：在中国，当朱子学居于稳固的主流地位后，其他思想随即试图对抗此已然成为主流思想的朱子学。相对于此，日本德川时代前半，朱子学开始正式被学习的同时，其他异质且新潮的儒家思想亦相继出现，儒学因而得以全面普及。诸多学派与朱子学同时并存而且持续扩散。当阳明学在中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时，其于日本的影响力却不大。再者，中国朱子学批判者多半是藉由重新诠释朱子学的内涵，而持续活用“理”这一概念，然日本的朱子学批判者往往言明其对“理”的不信与质疑。

中国与日本之儒学思想史中，存在着上述之近似与差异，此于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具有何种意义，乃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渡边教授希望借由本文能建立起解决上述提问的基础。

渡边教授举出双方比较、诠释儒学思想的多种方法。将日本或中国视为文化接触的一个例子加以诠释，即是其中一种；但在本文却不采用此

① 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

② 前引渡边浩：《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

种方法。渡边教授表示：原本中日两国的文化即存在着共通性及差异性，因此，儒学史亦产生了相近与差异。例如：二者对“理”的态度上的差距，便可解释为其乃两国文化或两国人民的“思考模式”、“精神构造”、“心性”、“民族性”之不同使然。此种方法，亦适用于将“中国之学”（唐国之“学”）视为是“方形”的、拘谨的、正经的。相对地，自认为“我皇国之古道”是“圆且平”的（贺茂真渊《国意》）国学者之自我形象，在继承了战前、战中的日本精神论之后，成为战后许多描述日本文化论、日本人论时的日本人之自画像。若吾人相信此种自画像是贯穿历史的真实，则先前的诠释就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虽然，尽管我们可暂时不以“文化”、“民族”等单位为当然之前提而来论其“固有”之特征。渡边教授认为上述的论述方法，存有以下几个难处。第一，其各自的文化特征并非以其儒学史为重要之资料而将之萃取出。特别是诸如所谓：“中国人（或日本人）如此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如此思考的基本倾向，这点从他们的思想中即可看出。”此类的循环论述方法难以避免。第二，该方法着眼于贯穿历史的特质，其结果难以说明历史的变化与发展。

渡边教授认为所有的思想史并非都具备无可类比的特性，亦非绝对不可比较的。同样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类，有时彼等遭遇到的思想、社会等各种问题会有许多共通点，而诸如人类该如何共存之类的课题，即可就此共通点来进行比较。我们亦可注意思想赖以成立之社会的“场域”，将特殊的“场域”作为可以扩张的架构而加以理解，如此一来进行比较应该是可行的。因此，渡边教授在本文当中针对（一）明代：与“功利”的竞赛和阳明学；（二）清代：“情理”与“考证学”；（三）日本：德川时代等三个主题加以论述。

渡边教授指出，日本德川时代儒者的出身来自各种阶层，但他们通常受到如同医生般的待遇。事实上，身为“儒医”而身兼二职的人为数不少。但是担任“御用儒者”，直接参与政事的情况则不多，因为当时“治国不用儒者”的想法是为常识，渡边教授将此种情况称为“儒者”们的悲哀。渡边教授另外指出，德川社会与中国不同，其政治与社会制度皆不背负将“古

圣先贤之道”视为正统而加以继承的神圣性。盖记载着“礼”的古“经”世界与现实难有交会之处。事实上掌握政治实权者是“御公仪”(幕府)的“公方样”(将军),他不以“圣天子”自命,在德川时代中没有“六部”之制,取而代之的是老中^①与三奉行^②,武家的礼仪亦难以称之为文雅。从新井白石(1657—1725)及徂徕学派的学者皆希望制定制度,与山县大貳(1725—1767)批判武家等这些事情来看,即可得知武家的统治制度中,无礼乃是儒者之一般认知。

至于与“理”共存构想的部分,渡边教授认为在日本儒学形成的十七世纪以前,那些对儒学感到兴趣的人,首先学习宋、元、明及朝鲜“理学者”的作品,但结果仍以朱子学系统为中心。原因是:(一)朱子学是无与伦比的集大成之学。其中有回答对“修己”与“治人”之道的摸索、对“历史”的兴趣、对“礼”的关心、对博物学的探求、对诗文的好尚等各种丰富的内容。实际上,日本的朱子学者是多样化的。(二)兴盛于明代的阳明学是一对抗正统朱子学之思想,或者是朱子学再度活性化的尝试。日本在没有正统朱子学的状况下,阳明学亦没有流行之理由。换言之,日本儒者没有必要或准备为了从“功利”、“伪善”中逃脱出,而深入“随处体认天理”、“静中养出端倪”、或是强调“慎独”这类的明代修养论。(三)在同时代的中国、朝鲜,朱子学有着正统教义的权威,所以理所当然地,德川时代的儒者首先学习的是朱子学系统的儒学。但是朱子学是激烈高唱“理”之尊严的思想,是希望藉由“理”的完全实现,为当下的世界带来理想秩序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在德川时代不可能轻易被完全接受。在本文中,渡边教授将焦点置于当时政治的核心问题与人类共存的构想,于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其与“理”的关系。

① “老中”,是江户幕府的官职之一,总理幕政,直属将军,位高权重,掌管朝廷与诸侯之间的政务大事。其编制仅有4至5名,每月以“月番”的方式交替勤务,通常由俸禄领有3万石以上粮饷的“谱代大名”充任。

② 江户时代的三奉行为勘定奉行、寺社奉行及町奉行。

三

第二篇论文《儒学与近世日本社会》^①，作者为黑住真先生，现任东京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思想史、伦理学、比较思想宗教。代表著作有《近世日本社会与儒教》^②、《复数性之日本思想》^③等。

本文主要在探讨儒学与儒者在近世日本社会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黑住教授首先说明近世日本儒学系从几乎没有背景和势力的状态下发足，亦即儒学是伴随着太平的到来，随着社会之深化而逐渐扎根于近世日本社会中，但是儒学这一类型的思想体系也决非独占着整个日本近世的思想界。换言之，儒学原本是从脆弱且某种限定的状况中出发，再慢慢拓展其势力而为人所接受。因此，在日本近世初期，儒学并不是一种热门的学问形态，儒者的地位亦不崇高。至近世前夕可以从事儒学，提供儒学发展的只有宫廷周边少数的博士家、神道家以及禅僧们，其中可称为儒学专家者只有博士家而已。但是，这也只是侍奉朝廷周边的少数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一种文化传授家业。当时日本并无像中国、朝鲜那般势力庞大的儒学官僚阶级存在。

其次，黑住教授分析近世日本的儒学之所以得以发展，是因为武士政权选择了避免依存于朝廷文化，试图在自身霸权掌握之下，利用其权势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掌管、处理文化生产之事。黑住教授举藤原惺窝(1561—1619)离开禅林，身着“深衣道服”表示其为儒者的这种异样风格，以儒宗之姿出现在德川家康(1542—1616)面前，及其门人林罗山忽视博士家的权威，而以广博的学识被家康任用这两件事做了说明。不过，也因为儒学于近世日本并不像在中国与朝鲜那样，与地位、权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反而使得儒者

① 黑住真：《儒学与近世日本社会》，收录于《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13卷（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

② 黑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东京：ペリカン社，2003年）。

③ 黑住真：《複数性の日本思想》，近刊。

有多元的发展。例如：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冈山藩主池田光政(1609—1682)、会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水户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等为政者因为喜好儒学，儒者因而受到提拔，成为幕府或各家大名(诸侯)之智囊。林罗山、山鹿素行、熊泽蕃山、山崎闇斋、新井白石、室鸠巢、荻生徂徕等人都是明显的例子。

另外，就日本近世初期的儒学书籍，黑住教授亦做了如下的论述。当时与儒学相关的书籍，大多是以假名写成启蒙书之类的名言集。也就是说，多半是以中国为素材，将其中对处世有益的句子节录下来，再用假名加以解读，教导人们各种处世方针这类的作品。而学者用汉文体写成的文集等作品之完成及出版，迟至十七世纪末叶方才问世。亦即在山崎闇斋(1618—1682)、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这些第二代儒者出现的时代，近世日本才真正具备学习儒学的环境。但是，在整个江户时代却有无数的“和训书”相继出版。这一点若是与儒学本家的中国及汉文作品拥有社会性权威的朝鲜相比，当是饶富趣味的。黑住教授也指出在近世日本的言语世界中，除了少数儒学者的自负和游艺性的诗文趣味外，一般而言，汉语要具备实用以上的特权性是不可能的。

有关近世日本儒学的批判风潮，黑住教授分析儒学在日本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市场后，发生“自立门户”营生之事，此种现象可在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辨别儒、佛，甚且对旧儒者的博士家夸示“新注”之情况中窥见其端倪。自年轻时代即对汉学样样精通的林罗山在元和九年(1623)被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任用时，便开始揭举其专一于朱子学的鲜明旗帜，因而遭人批判其为“俗儒”、其学为“俗学”，一般以为林罗山等儒学陷入知识主义而衍生出不单纯的买卖行为。此一风潮在整个近世日本，无止尽地持续着。黑住教授引述他的恩师相良亨教授的论文，举例说明伊藤仁斋之批评山崎闇斋，荻生徂徕之批评山崎闇斋、伊藤仁斋，石田梅岩(1685—1744)之批判伊藤仁斋，怀德堂^①儒者之批判荻生徂徕等，此类批评形成一个儒学论争史。

^① 怀德堂乃享保九年(1724)由大阪商人成立的乡学校，又称怀德书院。先后由三宅石庵、中井鼈庵、中井竹山、中井履轩等人主持，至明治二年(1869)废校。

彼等儒者各自寻求其自以为正当的“本意”、“道”、“心”。这种纯粹化的源流系统若从儒学史的观点来看,则山崎闇斋的纯粹朱子学、山鹿素行的尧、舜、孔子之道(圣学)、伊藤仁斋的古义学、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等构成了种种持续的“批判性精神”运动。有趣的是:彼等同时又将非正统儒学之要素引入儒学体系中。如林罗山引入日本史学、日本文学、神道,山鹿素行引入兵学、和(日本)学,山崎闇斋引入神道,伊藤仁斋则是引入町众(仕绅)的生活等,都是明显的例子。

在本文中,黑住教授也针对宗教领域的死、生、祭祀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其述及近世初期的日本,神、佛的信仰根深抵固,且势力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儒学和神、佛交涉之际,儒学不得不在此种被蚕食干涉的状态下主张其存在。例如以孔子为神,从事祭祀,并将释奠体制化。非但如此,儒学在国家的礼乐、家族(宗族)的礼、祭,以及个人内面的规范等,几乎在所有信仰的各个场合中均发挥其力量。

黑住教授把宋学解释为是一将佛教的高度思想力,脱胎换骨后重新构筑而成的思想,又说儒、佛可谓是“一丘之貉”(此采用黑住教授之原文),两者是围绕神而相互竞争,尤其是佛教藉由寺檀制以确立其管理死后世界的葬祭权,在近世日本社会复杂的思想体制上,要采用儒葬或进行神葬,又衍生了许多争议,只是一般社会中佛教式的葬仪并没有被颠覆。到近世中期,儒学的地位逐渐稳定之后,儒、佛各自分立,才停止彼此竞争的状态。黑住教授将儒学定位为非宗教性的存在,神与佛各自管理生与死之祭祀领域,而儒者扮演着将非宗教性的“学问”提供为世人所用的角色,此即日本近世思想体制中,所谓神、儒、佛“习合”的统一形态。

黑住教授就儒学的道德述及在武士构筑的近世日本社会中,儒者有意以儒教道德与伦理将近世社会规律化,这个意图在德川家康以后更露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者,首先用以吸引德川家康等人注意的,就是自身以“道”的传达者自居。他们注意到儒学中的宋、明理学,强调此为道学,并将之与过去的汉学区分开来。宋学于中世时期传至日本,首先在神道家或佛僧间流传,但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者则批判彼等而自许为宋学的专家。近

世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的交通大开后，经由船舶运载到日本的书籍资讯中，最具震撼力的就是宋学书籍。近世日本儒者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刺激与影响，认为其对建设新日本社会将有所帮助，于是宋学才为近世日本所接受。而此皆导因于道学的力量及其于当时所占据的优势所致。

四

第三篇论文《战中、战后徂徠论批判：以初期丸山、吉川两学说的检讨为中心》^①，作者平石直昭先生，现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平石先生的指导教授就是丸山真男教授。平石教授乃继承丸山真男近代主义之批判路线的知名学者，也是研究荻生徂徠（1666—1728）、横井小楠（1809—1869）、福泽谕吉（1835—1901）、丸山真男（1914—1996）思想史的硕学，现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

本文主要内容在检讨战后四十年的日本徂徠学研究史，并针对其特征做具体的描述。平石教授举了以下四个检讨“初期丸山学说”的原因：（一）本文所讨论的丸山学说是四十多年前写的旧作，故曰“初期”。因为丸山真男在战后大大推动了徂徠学研究。（二）平石教授所称的“初期丸山学说”，当代学者们多未能切实深读其论文，有时甚至置之不理。（三）平石教授一方面透过对荻生徂徠与福泽谕吉的研究，从中学习，同时又钻研丸山真男与藤田省三的各种著作。^②经过这样的学习之后，平石教授以自身认识的徂徠思想观重读丸山真男的初期作品后，才意识到有再度全面检讨其论文的必要性。“初期丸山学说”对于徂徠学“近代”之理解，虽然具有非常出色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却又有其不足之处，而这两种层面复杂地纠葛在一起，成了

① 平石直昭：《社会科学研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87年）39卷1号。

② 作者本身述及他从丸山在《日本の思想》[收入《岩波讲座：现代思想》11卷《现代日本の思想》（1957年），后改收入《日本の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中，对明治国家所作的批判，及藤田省三在《体制の構想》[《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8卷（东京：筑摩书房，1961年），后改收入《现代史断章》（东京：未来社，1974年）]中，对“主体”概念之相关意思所作的分析，得到相当大的启发。

战后研究者的绊脚石。在理论的分析范畴方面,它长期阻碍了全面重新架构徂徕学之研究工作。上述原由即是平石教授撰写本文的动机。以下就本文内容做一摘述。

平石教授首先指出日本战后四十年的徂徕学研究史之特征:六十年代之前以“近代思维的成长”之观点较占优势,七十年代以还,“日本化”的观点开始有所发展,然而其全体观却模糊不清。平石教授认为此种徂徕学研究的现象,似乎与中间夹杂着高度经济成长之战后日本知识状况相呼应。平石教授另外指出:在徂徕学研究史中,潜藏着丸山真男初期学说的整体形象。同时发现战后的徂徕学研究史当中,存在着几乎没有学者尝试追究其间关系,却意图创造出一个新的徂徕观这两项问题。

平石教授于本文所论述的主题为:检讨战中、战后日本的徂徕论,以全面重新架构徂徕学的研究方向。文中检讨“丸山初期学说”以及论点与丸山相左,且又对徂徕学研究有所影响的“吉川幸次郎学说”。吉川幸次郎(1904—1980)分析徂徕学乃立基于其专业——中国学(汉学)——的学识,因此其分析主轴与其说是近代对封建,倒不如说是中、日思想比较论。尤其,在思想之内在分析方面,吉川幸次郎在《徂徕学案》中,运用其对于渊博的中国文学专业素养,针对徂徕的古文辞学与经学的关联性上,提出具启发性的新见解。平石教授则运用比丸山真男更彻底的“近代”观点,分析徂徕学,借以完整阐明广博的徂徕思想之历史意义。

(一) 对丸山真男学说之检讨

平石教授指出:丸山真男撰写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①第一章“近世儒教发展中的徂徕特质及其与国学的关系”的内容,过于注重“政治思维的优势”、“公私的分裂”,高度评价荻生徂徕从道德的理性主义中,解放了私的领域中之文学、历史、学问。强调政治是以与道德规范的存在为前提,并与“无秩序”相对立。同书第二章“近世日本政治思想的‘自然’与‘作为’——

^①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